

从秩序到权力：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 外交的演进^{*}

□ 王 浩

〔提 要〕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国际秩序的冲击打破了国际关系理论关于霸权国维持现状偏好的假设，修正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研究的一种新范式。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的修正主义外交出现一系列重大新变化：对多边机制与国际组织的规范性不满加深，给现行国际秩序造成更大冲击；对全球权力格局和均势的分配性不满，试图通过构建势力范围、对他国极限施压、武力干预以及进行领土扩张等方式谋求更大的现实利益、强化美国的硬实力优势。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从秩序到权力的演进植根于保守民粹主义持续兴起、总统威权化执政模式形成和大国竞争日趋复杂的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双重逻辑。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进一步削弱了国际体系的稳定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也面临国际体系规范、全球权力结构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等内外因素的多重制约。

〔关 键 词〕 特朗普政府、美国外交、修正主义、国际秩序、大国竞争

〔作者简介〕 王 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D87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26) 3 期 0092-22

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以霸权稳定论和权力转移理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研

^{*} 本文是复旦—金光思想库 2025 年度课题（项目批准号：JGSXK2509）的阶段性成果。

究范式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守成国存在“维持现状”(status-quo)偏好、崛起国/新兴大国则是“修正主义”(revisionism)国家，原因在于前者往往是既存国际秩序的创立者、主导者和受益者，后者则不满足于现状、试图分享主导权甚至颠覆既存秩序。^[1]然而，自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开始，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却表现出日益显著的修正主义倾向，不仅公开表达对现有多边机制与国际组织的严重不满，而且在实践中通过大规模贸易战、一系列单边“退群”行为和对盟友关系的重新定义，对二战后由其主导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修正主义霸权”随之成为美国外交研究的一种新范式。^[2]第二任期开启后，美国外交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延续并进一步强化了对多边机制与国际组织的不满、抵触甚至破坏，另一方面则将其修正主义倾向拓展至全球权力结构和均势领域，试图谋求更大的现实利益并强化美国的硬实力优势。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以对国际秩序的修正为主、包含少量的权力修正成分，那么其第二任期外交则显著增加了对全球权力结构和均势的修正。从学理和实践两个维度剖析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演进，评估其对国际体系和美国领导地位造成的重大影响，分析其面临的制约，有助于加深对美国外交转型趋势的理解与把握。

一、修正主义的类型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实践

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源自国家对世界事务状况的不满。^[3]按照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兰德·施韦勒的观点，国家为改变与维持现状所分别愿意付出

[1] A. F. K. Organsky,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123;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2] G.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3, 2017, pp.2-9; Doug Stokes, “Trump,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p.133.

[3] Alexander Cooley, Daniel Nexon and Steven Ward, “Revising Order or Challenging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An Alternative Typology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5, No.4, 2019, pp.689-708.

的成本的比值是衡量其修正主义程度的标准，比值越高则修正主义偏好越显著。^[1]从具体来源看，修正主义偏好的形成与国家对国际体系中的既存规则、制度安排、领土资源分配、军事力量格局及自身声望等现状的不满紧密相关。^[2]以此为基础，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史蒂文·沃德将修正主义的衡量标准与产生来源纳入不同维度的变量中，运用类型学方法在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进一步赋予其可操作性和应用空间，使之发展为一个逻辑更为严密的学术概念和一项可供检验的外交政策分析框架。

沃德认为，修正主义是一个双维概念，主要由建立在“规范性不满”（normative dissatisfaction）和“分配性不满”（distributive dissatisfaction）基础上试图改变现状的战略意图及其相应外交政策构成。^[3]前者指对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的不满，后者则强调对更强的军事力量、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更多的领土资源等的野心和追求。依据这一划分标准，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国家主要有三个类别：一是“激进型修正主义”（revolutionary revisionism）国家，它们对现状兼具规范性不满与分配性不满，如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都试图彻底颠覆当时的国际秩序和权力格局；二是“改革型修正主义”（reformist revisionism）国家，表现为对现状的规范性不满，如20世纪初的美国试图以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为契机，通过“十四点计划”改革由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三是“地位型修正主义”（positionalist revisionism）国家，表现为对现状的分配性不满，如冷战后的俄罗斯一方面试图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另一

[1]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88-100.

[2] Jason Davidson, “The Roots of Revisionism: Fascist Italy, 1922-39,” *Security Studies*, Vol.11, No.4, 2002, pp.125-159; Sten Rynning and Jens Ringsmose, “Why Are Revisionist States Revisionist? Reviving Classical Realism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5, No.1, 2008, p.19.

[3]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Steven Ward, “Race, Status, and Japanese Revisionism in the Early 1930s,” *Security Studies*, Vol.22, No.4, 2013, pp.608-609.

方面对北约东扩蚕食其安全利益与削弱其国际地位强烈不满。与上述三类相对应的是维持现状国家，即在规范和分配两个层面均对现状感到满意的国家，典型代表为冷战后的美国。^[1]

上述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厘清了修正主义的不同类型及其背后逻辑。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明显局限，集中表现为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惯于将自己划归为维持现状国家，这就导致这一分析框架和路径大体遵循了传统的“守成国 / 维持现状 vs 崛起国 / 修正主义”的二元假定，无法将近年来日益凸显的作为“修正主义霸权”的美国及其外交转型趋势和逻辑纳入其中进行系统审视。本文尝试打破上述二元假定并借鉴既有研究框架，将其转化、扩展和运用到对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探讨之中。所述修正主义主体是对国际秩序演变具有显著冲击力和破坏性，并且处于全球权力格局顶端、不存在对自身地位不满的霸权国。本文将美国分别基于对国际秩序的规范性不满和对全球权力格局 / 均势的分配性不满而形成的修正主义外交界定为“秩序型修正主义”和“权力型修正主义”。

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主要是规范性不满催生的秩序型修正主义，其中也包含少量的权力型修正主义成分。早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便提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外交理念，多次表达对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并长期维护的多边机制与国际组织的不满。执政后，特朗普通过三方面行动不断推进修正主义外交并对国际秩序发起冲击。一是对世界贸易秩序的“修正”。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针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发动多轮关税战并推动国会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相关法案，严重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破坏了全球贸易秩序甚至逆转了冷战后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2]二是对美国全球联盟体系尤其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修正”。联盟责任分摊成为特朗普政府对盟友施压的主题，双方围绕防务开支问题等展开了激烈博弈。

[1]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2] 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9 页。

其中，要求北约成员国大幅增加军费以及重新评估北约集体防御条款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诉求。在美国持续施压下，北约盟友同意大幅增加军费、更快兑现军费开支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1]三是对既有多边机制、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模式的“修正”。美国开始拒绝承担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义务，大幅削减国际组织经费预算并从一系列多边协定和国际组织中退出，对既有多边机制的有效运转形成冲击，并导致多个领域的全球治理(如气候变化)出现倒退。^[2]

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实践表明，霸权 / 守成国基于规范性不满而推行的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与西方既有现实主义理论视阈下的崛起国 / 新兴大国的改革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存在两方面根本区别。一是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更大。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美国的修正主义行为带来的冲击远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经贸、联盟体系和多边合作的政策转型，给经济全球化、美国同盟友的关系以及全球治理都带来了重大甚至不可逆的冲击。二是几乎不具备任何建设性，以破坏性为主。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具有建设性，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多元和开放的国际经贸体系、多边合作机制和全球治理模式，以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然而，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对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影响则是破坏性的，不仅没有提出替代方案，反而基于私利大搞“退群”和单边主义外交，造成了国际秩序的倒退。

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也存在一定的权力型修正主义。无论是对中国的竞争性战略和全政府式打压、以关税和产业政策力推制造业回流美国，还是试图通过重新分配联盟责任与经贸收益来强化美国相对优势，其背后都包含获取更多物质利益和增进美国权力的意图。总体而言，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修正

[1] 王浩、叶成城：《后自由国际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战略转型的两种路径》，《太平洋学报》2025 年第 3 期，第 35 页。

[2] 温尧：《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当代亚太》2019 年第 1 期，第 4-37 页。

主义外交主要指向对既有国际规则、制度和责任安排的不满，其修正重点尚未达到第二任期公开转向领土扩张、势力范围构建和关键资源攫取的程度。

二、从秩序到权力：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新变化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对美国内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其中，其修正主义外交变化成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关键。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试图更为全面、激进地重塑国际体系，其核心特征有两点：一是基于规范性不满的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冲击进一步增强，秩序型修正主义色彩愈发浓厚；二是基于分配性不满的权力型修正主义开始系统显现，试图通过强化势力范围、进行资源掠夺甚至发动军事冒险重塑全球权力结构和均势，强化美国硬实力优势。两相叠加的结果是，美国正朝着一个对现有国际体系更具破坏力的激进型修正主义国家方向转型。^[1]

（一）特朗普政府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强化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在经贸、联盟以及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等问题上延续并强化了“美国优先”理念，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进一步升级。

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较第一任期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呈现为更加直接地服务于美国再工业化和实现供应链重组的特征。早在 2024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以及共和党发布的最新版党纲即反复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目标在于实现贸易平衡、重振美国本土制造业从而重建“制造业超级大国”，以及增强供应链韧性。^[2] 在实践中，为追求贸易平衡，特朗普政府于 2025 年 4 月以外国的贸易和经济做法造成美国出现“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启动“全球对等关税”政策，

[1] 当然，同为激进型修正主义国家，美国作为霸权国对国际体系造成的破坏与历史上德日等崛起国有何差异，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限于篇幅、主题以及美国仍处于动态转型阶段，对此不作展开。

[2] “The 2024 Republican Platform,” <https://prod-static.gop.com/media/RNC2024-Platform.pdf>.

同时推出针对所有贸易伙伴的 10% 的基准关税与针对主要逆差经济体的更高关税。^[1]2026 年 2 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不授权总统以相关紧急状态为由征收此类关税。白宫随即依据《1974 年贸易法》第 122 条宣布征收为期 150 天的 10% 临时进口附加税。^[2]为重振本土制造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先后启动围绕制造业结构性产能等的 301 调查、以国家安全为由调整药品以及钢铝的进口措施。同时,特朗普政府还以税收优惠和投资便利化措施等方式吸引大型跨国公司和产业资本在美国投资设厂。^[3]为增强供应链韧性,特朗普政府将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战略资源在美生产和进口替代直接纳入国家安全框架,2026 年 1 月就加工关键矿产发起进口调整谈判,同年 4 月依据《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款对专利药及其原材料采取上限为 100% 的进口关税税率措施。^[4]以上政策动向表明,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经贸领域的秩序型修正主义政策进一步强化,不仅在于全球关税战规模和力度的升级,也在于一系列产业政策的跟进和配套使用。

在联盟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强化,则表现为从其第一任期围绕盟友“搭便车”问题的交易式施压,升级为对美国联盟体系在责任分配和利益回报等方面的系统性重估和全方位重塑。在跨大西洋联盟问题上,一方面,在 2025 年北约海牙峰会期间,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友将军费开支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2% 提高到 5% 并写入峰会宣言,进而在 2025 年《国家安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Declares National Emergency to Increase our Competitive Edge,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Strengthen our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April 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4/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declares-national-emergency-to-increase-our-competitive-edge-protect-our-sovereignty-and-strengthen-our-national-and-economic-security/>.

[2] Supreme Court of the US, “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February 20, 2026,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5pdf/24-1287_4gcj.pdf.

[3] The White House, “50 Wins in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June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5/06/50-wins-in-the-one-big-beautiful-bill/>.

[4] The White House, “Adjusting Imports of Processed Critical Minerals and Their Derivative Produc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6/01/adjusting-imports-of-processed-critical-minerals-and-their-derivative-products-into-the-united-states/>.

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由美国长期承担安全供给的模式难以为继。^[1] 另一方面，在 2026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进一步要求欧洲成为“更自立”的大陆，将对盟友的施压从单纯的军费分担扩大到战略与安全结构的重大调整。^[2] 在亚太联盟方面，特朗普政府同样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在 2025 年 9 月生效的美日框架协议中对日本输美商品设定 15% 的基准关税，以服务贸易平衡和产业回流的目标，还在 2026 年 3 月举行的美日首脑会晤中明确要求日本加快提升自身防务能力和增加防务预算。^[3] 伊朗危机爆发后，特朗普政府并未通过协商争取盟友支持，而是对包括盟友在内的任何直接或间接获取伊朗货物和服务的国家加征关税，同时以所谓“保护美国公民、盟友和利益”为名采取对伊军事行动，后又在伊方持续反击的背景下施压盟友配合对伊打击，再一次反映出其“美国优先”理念下的单边主义逻辑。^[4]

在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强化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延续和强化第一任期的“退群”外交。执政伊始，特朗普政府便先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协定》，停止对包括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内的联合国组织和项目的资助。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的冲击已不仅是消极抽离，而是具有进攻性的主动

[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Vision Drives NATO Breakthrough,” June 26,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5/06/president-trumps-leadership-vision-drives-nato-breakthrough/>.

[2] The White House, “In Munich, Secretary Rubio Calls on Allies to Embrace Shared Heritage, Meet Challenges of New Era,” February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2/in-munich-secretary-rubio-calls-on-allies-to-embrace-shared-heritage-meet-challenges-of-new-era/>.

[3]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mplements A Historic US-Japan Framework Agreement,” September 5,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9/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implements-a-historic-u-s-japan-framework-agreement/>;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trengthens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Americans,” March 19,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6/03/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trengthens-u-s-japan-alliance-for-the-benefit-of-all-americans/>.

[4]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trengthens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Americans,” March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6/03/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trengthens-u-s-japan-alliance-for-the-benefit-of-all-americans/>.

削弱。^[1]2026 年 1 月，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宣布启动退出多达 66 个国际组织，这对既有多边机制造成的冲击在力度和范围上都已远超其第一任期。^[2]二是在“退群”基础上，以“美国优先”理念为原则“另起炉灶”，绕开联合国等权威机构搭建新的机制平台，从而对其形成架空。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对不符合自身利益和主导权要求的既有机制减少参与、削弱支持甚至直接退出的行为，是对第一任期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延续，那么其试图构建服务于自身议程的新的机制平台，则是第二任期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的新形态。2026 年 1 月 16 日，特朗普政府在公布加沙冲突的全面解决方案时，公然绕开联合国推动的停火治理模式，将“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设定为关键机制，并迅速于 1 月 22 日正式批准其宪章、确立其为正式国际组织。^[3]三是对美国国内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相关的行政部门和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包括大幅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大力重振传统能源，要求对美国参与的所有国际组织展开全面审查。^[4]2025 年 12 月，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办公室的年

[1] The White House, “Withdraw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nd Ending Funding to Certain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and Reviewing United States Support to Al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ebruary 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withdrawing-the-united-states-from-and-ending-funding-to-certain-united-nations-organizations-and-reviewing-united-states-support-to-all-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ithdraw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7,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6/01/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withdraws-the-united-states-fro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that-are-contrary-to-the-interests-of-the-united-states/>.

[2]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Memoranda: Withdraw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ventions, and Treatie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7,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6/01/withdrawing-the-united-states-fro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conventions-and-treaties-that-are-contrary-to-the-interests-of-the-united-states/>.

[3]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 Ratifies Board of Peace in Historic Ceremony, Opening Path to Hope and Dignity for Gazans,” January 22,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1/president-trump-ratifies-board-of-peace-in-historic-ceremony-opening-path-to-hope-and-dignity-for-gazans/>.

[4] The White House, “Reevaluating and Realigning United States Foreign Aid,”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reevaluating-and-realigning-united-states-foreign-aid/>.

度报告指出，随着大量项目资金和职能转入国务院以及人员大幅缩减，该部门原有的独立运作能力已遭到严重削弱。^[1]

（二）特朗普政府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的系统展开

如果说秩序型修正主义及其破坏性的增强是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在程度上的变化，那么权力型修正主义的系统展开则是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更具实质性的新变化。它表现在对国际体系的规范性不满加剧的同时，大幅强化了对全球权力格局和均势的分配性不满，开始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挑战现状、更为赤裸裸地追求美国的现实利益和硬实力优势，对国际体系造成的冲击更加强烈。

在实践中，特朗普第二任期基于分配性不满的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主要表现为四类相互关联的政策：一是围绕运河、海湾和关键航道等战略空间提出更直接的主权性主张；二是在西半球通过军事行动、资源控制和排他性安全安排强化自身势力范围；三是在涉及盟友领土及其周边地区安全的问题上持续施压并试图松动既有主权边界；四是在地区冲突中更突出交易、强制甚至冒险手段，以此推动美国对地区权力格局的塑造。

首先，特朗普第二任期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最直接地体现为将重要国际战略空间和关键地缘节点视为掠夺对象并推到政策前台。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公开表示美国“将收回巴拿马运河”，并将其直接同美国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提出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2]在2026年2月发布的《美国海事行动计划》中，特朗普政府不仅将包括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内的国际水道的自由通行界定为美国必须直接维护的核心利益，还把北极水道安全、港口和造船能力、关键海上通道控制等纳入国家安全框

[1] USAID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Top Management Challenges Facing US Foreign Assistance in Fiscal Year 2026,” December 16, 2025, <https://oig.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2026-01/Top%20Management%20Challenges%20Facing%20U.S.%20Foreign%20Assistance%20in%20Fiscal%20Year%202026.pdf>.

[2] The White House, “The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1/the-inaugural-address/>.

架。^[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使上述空间和节点成为美国安全、经济和地缘优势的关键支点。^[2]

其次，特朗普政府在西半球通过军事行动、资源控制和排他性安全安排强化势力范围的做法，构成其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内核。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the Trump corollary）”，并将其置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位置，主张在西半球恢复美国优先地位，阻止域外竞争者控制战略性资产，并对该地区相关国家推行拉拢与扩展政策。^[3] 以此为背景，2026年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悍然发动空袭并实施突入行动，三角洲特种部队在目标点控制并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4] 在这场代号为“绝对决心行动”的抓捕实施后，特朗普宣称将“让美国大型油企进入并主导委内瑞拉石油的修复与运营”^[5]。1月4日，鲁比奥公开强调不能允许竞争者将西半球作为行动基地，表示“这是我们的半球”。^[6] 1月9日，白宫通过行政令将委内瑞拉石油收益纳入美方主导的金融

[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 Is Standing Up to Terrorism and Protect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e,” March 15,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5/03/president-trump-is-standing-up-to-terrorism-and-protecting-international-commerce/>; The White House, “America’s Maritime Action Plan,” February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6/02/Restoring-Americas-Maritime-Dominance.pdf>.

[2] Joseph M. Sweeney, “What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eans for Naval Forc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8,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means-naval-forces>.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4] “Mock House, CIA Source and Special Forces: The US Operation to Capture Maduro,” Reuters, January 4, 20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mock-house-cia-source-special-forces-us-operation-capture-maduro-2026-01-03/>.

[5] “Trump Says US Oil Companies Will Spend the Billions Needed to Restore Venezuela’s Crude Output,” Reuters, January 3, 20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trump-says-us-oil-companies-will-spend-billions-venezuela-2026-01-03/>.

[6] The White House, “RUBIO: This Is Our Hemisphere —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Allow Our Security to Be Threatened,” January 4,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1/rubio-this-is-our-hemisphere-and-president-trump-will-not-allow-our-security-to-be-threatened/>.

体系监管和处置框架中。^[1]由此可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地区安全、政权更迭与资源控制被结合起来加以推进，表明其势力范围构建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进攻性。

再次，特朗普政府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还体现在其针对其盟友的掠夺性霸权政策中，尤其是围绕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等涉及盟友领土主权及其周边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持续施压。2025年2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加拿大作为美国第51州会更好”，并以羞辱方式把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作“加拿大州州长”、把加拿大称作“伟大的加拿大州”，试图在政治话语上将加拿大降格为美国的附庸。^[2]在格陵兰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更是不顾丹麦和欧洲反对，将北约盟友这一领土当成可强买强取的标的。就任后，特朗普反复宣称出于美国国家安全与北极战略需要，美国“必须得到格陵兰”，并以“我们会拿下”的强硬姿态向丹麦持续施压，甚至在公开表态中暗示不排除采用强硬手段；在行动上，特朗普安排副总统万斯、国务卿鲁比奥与丹麦、格陵兰方面官员会谈，形成“先极限施压、再谈判逼迫对方让步”的霸凌模式。^[3]

最后，特朗普政府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在应对乌克兰危机和美以伊战争等地区安全危机时，表现为更强调交易、强制甚至高风险军事冒险，试图在短时间内获取现实利益并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以推动停火和结束战争为名对乌克兰持续施压，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所谓“美乌重建投资基金”谋求攫取乌克兰自然资源。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明确提出，该基金将取得乌克兰自然资源项目相关特许权

[1] The White House, “Safeguarding Venezuelan Oil Revenue for the Good of the American and Venezuelan People,” January 9,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6/01/safeguarding-venezuelan-oil-revenue-for-the-good-of-the-american-and-venezuelan-people/>.

[2] “Pres. Trump Says He’d Like for Canada to Become the 51st State,” C-SPAN, February 3, 2025, <https://www.c-span.org/clip/white-house-event/pres-trump-says-hed-like-for-canada-to-become-the-51st-state/5152113>.

[3] CNN Transcripts, “White House: Trump Acquiring Greenland is a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y,’” January 6, 2026, <https://transcripts.cnn.com/show/acd/date/2026-01-06/segment/01>.

使用费等收入的 50%。^[1] 在伊朗问题上,这一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强制性和冒险性体现得尤为明显。2026 年 2 月,特朗普政府在同伊朗进行核问题谈判期间悍然发动军事打击,对伊朗最高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在遭到伊方持续反击并逐步陷入冲突泥潭后,特朗普一方面反复宣称赢得胜利、分别摧毁和重创伊朗海军和空军,另一方面则要求那些未卷入战争但面临燃料短缺的国家向美国购买石油并自行保护海上运输线。^[2]

以上政策演变表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强化与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系统展开,使美国朝着更为极端的激进型修正主义霸权国家方向发展,持续从秩序与权力两个维度对国际体系造成冲击破坏。

三、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演进逻辑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不断演进,既有国内政治根源,也与国际环境相关,是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双重逻辑作用的产物。在实践中,尽管上述修正主义外交短期内可能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某些额外收益,但在中长期意义上将大幅削弱国际体系运转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美国自身全球领导地位。

(一) 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演进的双重逻辑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外交政策的修正主义转向便与保守民粹主义兴起的国内政治逻辑紧密相关。一方面,特朗普的执政基础建立在共和党传统保守派的内外政策利益诉求之上,其外交政策带有鲜明保守主义色彩,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ecures Agreement to Establish United States-Ukraine Reconstruction Investment Fund,” May 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5/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ecures-agreement-to-establish-united-states-ukraine-reconstruction-investment-fund/>.

[2]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 Delivers Powerful Primetime Address on Operation Epic Fury,” April 1,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4/president-trump-delivers-powerful-primetime-address-on-operation-epic-fury/>.

如信奉单边主义和实力地位、排斥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1]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胜选联盟”的构建，离不开以白人劳工为代表的右翼民粹派选民群体支持，因此其外交政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厚的右翼民粹主义烙印，而后者恰恰是对现状感到不满的产物。^[2] 这种不满投射到外交政策领域，首先表现为一系列强烈的“纠偏”诉求，包括“美国优先”理念下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对美国与其盟友在防务安全责任方面的“不对等”关系，以及反对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给美国造成的“不公正”后果。以此为基础，由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叠加产生的保守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便构成特朗普政府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国内政治逻辑。

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修正主义外交演进的国内政治逻辑在于，肇始于 2016 年的美国保守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运动在 2024 年大选中进一步壮大，特朗普以此宣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意授权”。统计数据显示，特朗普在此次大选中不仅赢得了全部七个摇摆州和普选票的多数、取得比 2016 年大选更为强势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保守派和民粹派两大核心选民群体对他的支持率分别高达 90% 和 67%、显著高于 2016 年和 2020 年的水平，为其大幅胜选立下了汗马功劳。^[3] 在所谓“民意授权”逻辑驱动下，特朗普组建起较其第一任期更强调政治忠诚度和行动一致性的执政团队，为其内政、外交决策的集权化、个人化甚至带有进攻性的独断专行提供了便利。其结果是，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更趋极端化，不仅表现在对国际秩序的不满程度和破坏性增大，而且其修正目标进一步升级，开始试图重塑全球权力结构，

[1] Robert C. Smith, “Ronald Reagan, Donald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Vol.10, No.2, 2021, pp.283-289.

[2]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 “Election 2024: Exit Polls,” CNN, December 13, 2024,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4/exit-polls/national-results/general/president/0>; “Exit Polls,” CNN,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0/exit-polls/president/national-results/0>; “2024 Time Series Studies,” ANES, <https://electionstudies.org/data-center/2024-time-series-study/>; “2020 Time Series Studies,” ANES, <https://electionstudies.org/data-center/2020-time-series-study/>.

通过领土扩张和强化势力范围等方式服务于“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很明显，后者已经超过了保守民粹主义理念界定的外交政策目标，尤其是“权力修正”逻辑意味着美国将可能卷入更多海外事务甚至地区冲突。因此，尽管保守民粹群体对特朗普政府秩序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仍持积极态度，但却围绕其权力型修正主义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产生了内部分裂。例如，在对伊朗动武问题上，包括前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前国会众议员乔玛丽·格林和知名保守派评论家塔克·卡尔森在内的原特朗普阵营得力干将纷纷倒戈，批评其扩张和干预政策背离了保守民粹主义原则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初衷。^[1]然而，执政联盟内部的分裂态势并未使特朗普改弦更张，反而促使其对内部异见人士展开猛烈政治打压。这就表明，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演化甚至异化趋势，不仅建立在既有的保守民粹主义传统基础之上，更离不开特朗普第二任期由更强政治基础、更忠诚执政团队带来的强势个人化、集权化以及进攻性执政理念和风格。在此背景下，反对海外军事干预的保守民粹派新生代领袖、副总统万斯只能被迫为特朗普背书，而鲁比奥、库什纳等党内鹰派和亲以色列势力则成为站在前台进行配合的积极角色。^[2]简言之，保守民粹主义的理念根基，连同建立在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和高度忠诚的执政团队基础上更具个人化的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拓展出更为系统的权力型修正主义的国内政治逻辑。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深化和拓展，植根于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对竞争抓手、竞争空间和竞争方式的三重认知变化。首先是竞争抓手的变化。特朗普第二任期国际竞争的重点并非是国际秩序和制度规则的主导权，而是对战略空间、关键资源、海上通道和地缘节点的控

[1] “Top US Security Official Quits, Says Iran did not Pose Immediate Threat,” Reuters, March 17,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us-national-counterterrorism-center-director-resigns-over-war-iran-2026-03-17/>.

[2] “Vance Says He Trusts Trump on Iran War, Plays down Differences,” Reuters, March 16,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vance-says-he-trusts-trump-iran-war-plays-down-differences-2026-03-16/>.

制。2025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 2026 年《美国海事行动计划》都表明了这一战略认知转向。二是对竞争空间的重新分层。西半球被特朗普政府视为至关重要的本土安全外延空间，印太地区和海上通道被视为维系工业基础和全球竞争力的功能性战略空间，中东则被界定为在防止敌对力量主导的同时避免陷入“无尽战争”的高风险战略空间。^[1] 上述空间认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特朗普第二任期权力型修正主义外交的地缘逻辑。三是在竞争方式上，现实主义强调的硬实力优势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尤其是进行大国博弈的主要手段，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正在从“仁慈盟主”转型为“掠夺霸权”^[2]。

（二）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影响

在上述双重逻辑作用下，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演进、特别是其第二任期以来在地缘政治上强化扩张性叙事与构建势力范围的做法，公开挑战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规范，使之日益具备激进型修正主义国家特征。在实践中，这一外交转向已对国际体系造成了两方面显著冲击，未来中长期负面影响尚难以充分预估。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动摇了国际体系稳定。二战结束以来，有赖于对主权边界与领土完整原则的普遍承认，以及对国际规则及其可预期性的共同信念，国际体系维持相对稳定。特朗普政府在涉及他国领土主权议题上的掠夺性姿态和行为，使得上述两项条件同时受损。即便相关行动未必立即转化为事实占领，也足以改变各国对美国的风险评估，系统性放大了安全困境，使世界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及从“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到“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的退化。^[3]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显著削弱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规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2] 刘丰：《从仁慈盟主到掠夺霸权：“特朗普 2.0”时代的美国联盟战略》，《外交评论》2026 年第 1 期，第 42-68 页。

[3] Brookings, “Breaking Down Trump’s 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8, 2025,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breaking-down-trumps-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范性权威”，进一步侵蚀其联盟体系的凝聚力。冷战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建立在军事与经济等硬实力之上，更依赖其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叙事供给与制度承诺。当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弱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与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权威，同时对国际法与规则表现出漠视，甚至习惯于以“胁迫+交易”的方式处理领土扩张、地区冲突与势力范围等议题时，美国事实上消耗了自身最关键的无形资产——信誉与合法性。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回应美国削减相关国际援助时明确指出，这些做法将使世界“更不健康、更不安全，也更不繁荣”。^[1]在政策实践中，围绕格陵兰岛的争议集中体现了美国“规范性权威”的式微。在此过程中，欧洲多国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做法、强调主权与国际法原则，并在政治与安全层面表达对丹麦和格陵兰的支持，反映出传统盟友对美国战略意图的深层疑虑正在上升。^[2]从联盟政治视角观察，这种疑虑将带来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促使盟友加速“去风险化”与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安全承诺依赖，从而削弱美国在盟友体系中的议程设置能力与战略政策号召力。^[3]更重要的是，一旦美国将规则视为工具而非约束，其对外倡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会出现内在悖论：美国要求他国遵守国际规范，自己却在关键议题上进行例外化处理，最终导致其国际动员能力和国际信誉的下降。

从安全层面延伸至更宏观战略层面，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把美国推向“以胁迫获取利益”的路径依赖模式，背离了作为全球领导国的根本行为逻辑。领导国地位的本质是让他国愿意跟随，而非不得不服从。当美国日益依赖关税、制裁、军事威慑与领土施压等强制手段时，其外交政策的边陲成

[1]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to the Press,” February 28, 2025,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press-events/2025-02-28/secretary-generals-remarks-the-press-please-scroll-down-for-arabic>.

[2] CSIS, “Trump’s Greenland Ambition Is About US Power, Not Alliances,” January 202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umps-greenland-ambition-about-us-power-not-alliances>.

[3] Alberto Alemanno, “Greenland and US Annexation Threats: Mapping the Legal Questions,” *Verfassungs Blog*, January 13, 2026, <https://verfassungsblog.de/greenland-and-us-annexation-threats/>.

本必然上升；同时，他国的合作将更趋交易化与短期化，使得美国在危机管理、规则谈判与制度建设中的协调能力下降。更现实的风险在于，这种强权化姿态削弱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吸引力。由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呈现一种悖论式下滑，即硬实力虽未下降、但合法性却被持续透支。

四、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面临的内外制约

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外交政策的修正主义色彩显著加深并带来一系列冲击，但并不意味其可以不受约束地实现极端战略诉求。相反，特朗普政府越是以胁迫、交易和强制为主要手段推进外交政策目标，其面临的外部反弹与内部阻力就越可能对其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总的来看，这种制约主要体现为国际体系规范的软制约、全球权力再平衡的结构制约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制度制约。

（一）国际体系规范的软制约：主权原则与合法性成本

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在国际体系层面面临规范制约，根源在于触碰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原则，即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及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改变边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会员国不得以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方式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尽管国际规范无法对其修正主义外交构成硬约束，但会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行为的定性，进而对其构成道义压力。

更重要的是，规范制约不仅表现为道义压力，还会通过合法性成本的提高增加美国推进修正主义外交的难度。以特朗普觊觎格陵兰岛为例，欧洲多国对主权与国际法原则的公开表态，意味着美国盟友开始将规范边界置于联盟关系之上，从而形成对特朗普政府的软制约。法国外交部发布的七国联合声明指出，格陵兰的未来“仅能由丹麦与格陵兰决定”，并以“格陵兰属于

[1]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Full Text),” Article 2(4),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其人民”的表述强化自决与主权逻辑。^[1] 这一联合声明也通过法国总统府等官方渠道同步发布，进一步显示其政治分量。^[2] 不仅如此，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于 2026 年 1 月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完全支持丹麦和格陵兰。欧洲议会党团领导人也公开呼吁欧盟机构向格陵兰与丹麦提供“具体可及的支持”。^[3] 尽管这类表态无法直接逆转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但却使之在国际社会处于道义和法律的双重下风，从而构成对美国霸权的软性约束。

（二）全球权力再平衡的结构制约：政策对冲与战略自主

如果说国际规范抬升了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政治成本，全球权力再平衡趋势则限定了其行动空间。当美国试图以势力范围与强制胁迫重塑权力分配格局时，难免触发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政策对冲，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加速崛起和美国盟友战略自主加速推进背景下，美国难以凭一己之力实现修正主义政策目标。在实践中，美国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华盛顿可以凭借军事优势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但由此引发的反击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的全球能源安全危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冒进政策构成强有力的制约甚至惩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战争爆发三周后评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行为切断了全球约 20% 的石油和海运液化天然气供应，无疑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显著负面冲击，其中总体通胀水平预计将被抬升 40 个基点。^[4]

[1]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Greenland Belongs to Its People’ – Seven European Countries Issue Joint Statement,” January 6, 2026, <https://uk.diplomatie.gouv.fr/en/greenland-belongs-its-people-seven-european-countries-issue-joint-statement>.

[2] Élysée, “Joint Statement on Greenland,” January 6, 2026, <https://www.elysee.fr/en/emmanuel-macron/2026/01/06/joint-statement-on-greenland>.

[3] European Parliament, “EP Group Leaders Express Unequivocal Support to Greenland and Denmark,” January 14, 2026,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60113IPR32390/ep-group-leaders-unequivocally-support-greenland-and-denmark>.

[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ess Briefing Transcript: Julie Kozack, Director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IMF,” March 19, 2026,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6/03/20/tr-03192026-imf-regular-press-briefing-march-19-2026>.

从更长期视角看，欧洲战略自主的政策辩论在当前背景下进一步升温，也将形成对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战略牵制。英国《金融时报》明确提出，欧洲应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推进“更强的自主性”，其论述虽属观点性文本，但反映了欧洲政策圈对美国不确定性的认知转向：从“通过让步维持关系”逐步转向“通过自主减少脆弱性”。^[1] 这种倾向若与欧盟产业政策、安全政策相结合，将在更广泛层面削弱美国对盟友体系的议程设置能力。在此背景下，当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与盟友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时，北约内部的协商机制会成为欧洲盟友拖住美国的工具。美联社关于北约如何运作的解释性报道指出，北约机制并不会自动为美国在与丹麦相关的冲突中提供支持，反而可能在欧洲日益强调战略自主的逻辑下加剧联盟内部分歧并损害其凝聚力。^[2]

（三）美国国内政治的制度制约

除外部制约外，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也面临国内政治制约。尽管总统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自由度和决策权远大于在国内政策领域，并且共和党同时掌控白宫和国会的政治结构会进一步放大特朗普高度个人化和集权化的决策模式，但美国政治以权力分立与制衡为原则的制度设计仍能围绕一些较具争议的外交政策议题对总统施加影响，弱化其极端色彩。概言之，来自美国国内政治的制度制约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国会虽然无法阻止总统发动有限军事行动，却能通过立法动议产生政治影响并通过宣战权约束其后续规模；其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决有能力削弱总统特定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基础，从而迫使其退而求其次、改变政策推行路径。

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国国会民主党甚至少数共和党议员都迅速做出反应，尤其是援引《战争权力法》进行立法动议，以约束总统行为。2026年1月，由几位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联合推动战争权决议，目的是阻止美军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继续在委内瑞拉境

[1] Financial Times, “Europe Should Embrace the Idea of Going It Alone,” January 12, 2026, <https://www.ft.com/content/1da08f67-c192-4fd6-b786-e88e1358e237>.

[2] Associated Press, “How NATO Works at a Time When Trump Is Threatening to Seize Greenland,” January 13, 2026, <https://apnews.com/article/4907c132b499531d8d5fe6cd549c0beb>.

内进行敌对行动。尽管在参议院后续投票中该决议没有通过，但表明了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外交政策并不具备完全稳定的国内政治制度基础。^[1]2026 年 3 月，几乎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在国会民主党人援引《战争权力法》制约特朗普政府极端政策的投票过程中，参众两院分别呈现出 47 票赞成、53 票反对和 212 票赞成、219 票反对的高度接近的结果。^[2]上述事实表明，特朗普政府并未掌握足以保障其战争政策持续进行甚至扩大的国内政治优势。这也是其在军事行动中反复宣称取得胜利、施压对方谈判并追求尽早脱身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和裁决虽然无法直接逆转总统既有政策，但会在法律层面削弱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的合法性基础，进而迫使其调整政策路径。例如在关税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发动全球关税战的极端政策遭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否定性裁决。尽管白宫随即依据《1974 年贸易法》第 122 条延续其关税政策，并通过新的 301 调查条款继续推行经济民族主义贸易政策，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由此开始不得不面临两项制度制约：一是其临时进口附加税最长只能维持 150 天、除非国会另行延长；二是关税税率上限为 15%。这表明国内政治制度制约并非无效，它至少压缩了总统可用工具的法律空间，也提高了其将临时性强制措施长期化、常态化的制度成本。^[3]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上述裁决是在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就表明即便特朗普第二任期拥有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和更大的权力基础，国内政治制度仍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发挥制约作用。

[1] US Senate, "Roll Call Vote No. 00009," January 14, 2026, 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call_votes/vote1192/vote_119_2_00009.htm.

[2] US Senate, "Roll Call Vote 46, S.J.Res.104," March 4, 2026, 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call_votes/vote1192/vote_119_2_00046.htm; Clerk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oll Call 85, H.Con.Res.38," March 5, 2026, <https://clerk.house.gov/Votes/202685>.

[3] Supreme Court of the US, "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February 20, 2026,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5pdf/24-1287_4gcj.pdf; 19 US Code § 2132, "Temporary Import Surcharge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fice of the Law Revision Counsel, <https://uscode.house.gov/view.xhtml?edition=prelim&num=0&req=granuleid%3AUSC-prelim-title19-section2132>.

五、结语

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挑战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在两届任期内经历了逐步深化和拓展的过程，在实践中体现出“从秩序到权力”的演进轨迹。这一政策演进逻辑既植根于美国国内保守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执政环境的变化，也与美国对自身相对优势下降的焦虑不断加剧密切相关。在由秩序型修正主义与权力型修正主义共同构成的激进型修正主义外交政策转型过程中，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了更大冲击，也在更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展望未来，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走向存在进一步激进化的可能，也将受到来自国际体系规范、全球权力结构和国内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因此，特朗普政府修正主义外交将在高烈度冲击与高成本回撤之间反复摆动，包括短期内以强硬姿态制造震荡、争取谈判筹码，中长期则在外部的反制与内部的掣肘下转向更为碎片化、交易化与机会主义式的推进方式。对国际社会而言，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秩序将更难回到稳定的制度预期之中，而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修正主义外交的关键，则在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成员国形成更强的规范性反制与结构性对冲，从而将美国对秩序与权力的修正冲动锁定在有限范围之内。

【责任编辑：王玉莹】